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中国近代爱国人士 (上)

韩文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韩文主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634-1722-2

I. 中…

II. 韩…

III. 历史知识—少年读物—课外—中国

IV. Z2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159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延吉市公园街 105 号 邮政编码 133002)

中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 450 印张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1188.00 元(本卷 16.50 元)

目 录

◎陈独秀.....	1
◎唐继尧.....	58
◎李大钊.....	62
◎宋教仁.....	165
◎郑观应.....	191
◎容闳.....	192
◎赵世炎.....	193

◎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 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 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 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 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 年领导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 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

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的思想来源与文化选择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都有其内在的

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探讨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时势)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文亦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早年心路历程的切入点。

在时间上，至 1879 年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 20 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陈独秀的青少年期是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其间，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相继爆发。中法战争时期，陈独秀还是一个儿童，战场主要在东南沿海及华南，远离安徽。这场战争对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蕞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遝然矣。”894 年一位从安徽来南京赶考的名叫“朱照”的廪生

上书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自五、六月来，念天下事深切杞忧，或中夜中坐起，或对食忘餐。审计深算，极心思之力，以求中国自强之策，而九重高远，未由上闻，诸王公大人前亦怀欲陈之而未得路，于是稿成而复毁者数四。”

是年陈独秀 15 岁，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道：“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陈独秀正面临着“康党”与“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 16 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

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⁵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如容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伍廷芳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

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大至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是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试验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

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

二、从《扬子江形势论略》看《时务报》对陈独秀的影响

《扬子江形势论略》(简称《论略》)是 1897 年底陈独秀撰写并印发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作品(据说同期他还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并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三篇文章都与长江筹防有关,参见任建树著《陈独秀传》)。18 岁的陈独秀就此主题写点文章并不奇怪(前面提到的上书张之洞的皖籍青年实际上与陈独秀属同一类型)。奇怪的是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论变法救亡,而是专注于长江筹防,俨然一位胸怀韬略、又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军。他在《论略》结尾处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近时敌鼯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

这段文字的确令人称奇,因为他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列强的对华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文中他对长江流域地理与军事的谙熟程度。只有 7000 余字的《论略》却能“广征博引,纵

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8岁的陈独秀最远也只到过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过新式学堂，能作如此鸿文，的确使人感到“惊异”。

“惊异”使人生疑。《论略》中的材料到底从何处获得的呢？作者并没有像今人写论文那样提供确切的出处，只是含糊地讲了一句“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论”。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早年的这一杰作。这样“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论”就成了“破译”该案的重要线索。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1897年夏天赴南京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对那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

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陈独秀在回忆这一幕时几乎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陈独秀的这段自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经是《时务报》的读者，正是因为先前阅读《时务报》，才使他在那“一两个钟头”里“改宗”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是怎样读到《时务报》的，《时务报》对他产生了那些影响。

首先，考察陈独秀能否读到《时务报》，答案是肯定的。翻开《时务报》，在封底该报代销点的名册上“安庆”二字赫然在目。安徽全省共有《时务报》的代销点 9 处，其中安庆有 4 处。据该报第 50 册(农历 1897 年底出版)公布的统计资料，安徽全省共代销《时务报》25628 册。

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瞽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读了梁启超的文字，便有“茅塞顿开”、“昨

非而今是”之感，这不独是陈独秀，在世纪之交，新潮的青年人概莫能外。其间对陈独秀产生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在《时务报》初期所作的《变法通议》。《变法通议》作为一组系列文章，主要内容是讨论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梁氏在文中条分缕析，这为陈独秀在南京科场上的异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所以说，陈氏的“异动”也是合理的。

不宁惟是，当绝意于举业的陈独秀从南京回到安庆后，自然面临着人生之路的选择：今后干什么？从时间上来推论，正是在 1897 年下半年他将精力投入到了《论略》的资料搜集、写作及刊印上。

陈独秀所作的《论略》正是得益于阅读《时务报》。披阅《时务报》，可发现 1897 年上半年《时务报》连载两篇文章。一是《扬子江筹防刍议》(第 21~22、24~26 册连载)，二是《查阅沿江炮台禀》(第 28~30 册连载)，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雷诺、来春石泰与骆博凯，均为德国人，他们奉两江总督之命，在 1896 年对从吴淞口至南京沿江进行实地考察后写成考察报告，内容当然非常详尽。将《时务报》上的这两篇文章与陈独秀写的《论略》对照，不难发现，《论略》中的不少材料、尤其是有关长

江防务的方案均来自《时务报》上的文字。

以上考证，不只是为了揭示了《论略》的资料来源，更不是要得出陈独秀作《论略》不过是借用了他人的材料，而是要说明的确是《时务报》“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行动”。1897年前后，当同龄人还在穷经皓首地捧读四书五经的时候，陈独秀却成了康、梁的信徒。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成为梁启超的信徒后，不只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为国运民瘼献计献策，并将自己的主张刻印散发，广泛传播，以唤起国人救亡意识。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此种行为方式也是仿效了他所推崇的梁启超。

三、留日时期陈独秀的文化接受与行为取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异国遥领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向国内青年大量输入域外的新知新学，国内学子由此眼界大开，并吸引了一批青年人东渡日本求学。因此说，戊戌后的中国朝政虽然极度黑暗，但思想文化界正进入一个活跃期。

在政潮汹涌的1898年，很难发现陈独秀弃绝举业后的所思所想。只知道他随继父去了东北沈阳，在衙门里当差，做点文书工作，其间为母亲奔丧回

故里一次。“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他在东北“曾目睹……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数。”耳闻目睹，使陈独秀更进一步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再也不愿照旧走生活老路的青年陈独秀，决心告别妻儿，于1901年11月加入了自费留日的行列，次年春(约3月)回到安庆。

反映陈独秀在东京数月留学生活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资料并不多，但有两点理应加以关注。

一、初次出国的陈独秀不免会带有一种好奇心来观察数年前曾打败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何以小而强、中国何以大而弱，中日从国家制度到民间生活，有什么异同。

二、留学生群体对他的影响。初到日本的陈独秀因言语不通等缘故，主要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先期抵日的中国人的言行对陈氏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间陈独秀曾参加过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的“励

志社”的一些活动。阅读报刊是陈独秀接受新知的主要渠道，当时的中文报刊主要有《清议报》、《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唤起国人救亡意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陈独秀在阅读这些报刊时，不免有先睹为快之感，更希望国内的乡亲也能分享到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日办报的动机也许此时正在萌生。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以他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新的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此三项启蒙之策早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就曾积极鼓吹。但当时风气未开，呼应者多在一些商都大埠。经历过闯关东、下东洋的陈独秀，较当年写作《论略》时要成熟许多。他开始寻找同道者，推动乡里的启蒙活动。陈独秀经由南京到安庆，一路寻访青年志士，切磋救亡之策。回到安庆后即与几位青年创设藏书楼，传播他从日本带回的书刊，并聚众演讲。同时他还打算创办一份刊物《爱国新报》。其宗旨是“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这样的办报宗旨在世纪初几乎是一种统一的“口径”，主要

是受梁启超《清议报》的影响，欲步其后尘。陈氏在安庆的所为，是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听众、读者，扩大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其间，初显其组织、筹划才能，可以说陈独秀由此踏上了他的政治人生之路。陈独秀的所为也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忌恨，9月再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第二次留日的时间也很短暂(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增速很快，其思想、活动及对国内政治与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1902年4月由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孙中山、梁启超列名赞成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相继在东京、横滨举行。这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排满”在留日的中国人中间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排满”活动也由地下转入公开。7月28日留日学生因与清驻日公使在自费生能否入军校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吴稚晖欲投河自杀、胡汉民率数人退学抗议的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凡此表明，留学界已不像陈独秀第一次来日本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陈独秀抵日后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冬，张继、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

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陈独秀亦加入了这一组织。

1902年11月上海的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旋即在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国内学界风潮随后涌动。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和《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梁氏在报上批评该校总办人非其才，难辞其咎：“中国今日举国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惟有虚心勿自尊大，而常以爱学生为目的，则虽不能完备，而可望有渐趋完备之一日。若欲仇视民权自由之论，运手段以压制之，吾敢信其虽总办易十人，而学生不能安如故也。”

也许是受到南洋公学学生的示范或梁氏文章的“启发”，陈独秀等很快便导演了一幕活报剧。1903年3月底，鉴于清政府委派的管理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作风卑劣，阻挠学生学习军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独秀等涉案的三人因此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第二次留学的时间虽短，但却进一步促使他成为一名思想与行动上的革命青年，一名较为